

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王兰兰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西安文理学院 科研处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唐代历史上,先后曾有四位皇帝在危急关头离京避难,其出幸地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四次避难均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唐王朝衰亡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暮穷途的李唐政权。

关键词: 唐朝; 皇帝; 避难所

中图分类号: K2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1)04-0021-04

Emperors' Shelters in Tang Dynasty

WANG Lan-l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710062; China;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 710065 , China)

Abstract: Four emperors had ever left their capital in crisis in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They found some shelters to stay safely. The choice of their shelter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four refuges all occurr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 Lushan Rebellion, which, more or le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poning the decline of Tang dynasty, but could not radically save Li Tang regim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emperor; shelters

唐朝 289 年间,有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国内出现内乱或外族入侵京师时,皇帝出京避难,后又收复京师,重登龙椅。在唐代共有四位皇帝上演过这样的活剧。本文拟对其避难所之选择及其产生的影响试作分析。

一 玄宗幸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十三日凌晨,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等仓皇逃出大明宫,出延秋门西行,过便桥,经咸阳、金城

县,至马嵬驿发生兵变,禁军杀杨国忠,又迫使玄宗处死杨贵妃。此后,众人赏议前行方向,“军士或言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言还京为便。韦諝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兵马未集,恐非万全,不如且幸扶风,徐图所向。’”^[1] (P232-233) 至扶风郡,“军士各怀去就,咸出丑言……会益州贡春彩十万匹”,^[1] (P233) 玄宗命悉置于庭中,召诸将士慰谕,众心乃定。此后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南),入故道,经河池郡(今凤县东北凤州镇)、西县(今陕西勉县),入金牛道,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西南昭化镇),渡

收稿日期: 2011-03-15

作者简介: 王兰兰(1972—),女,陕西凤翔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文理学院科研处干部。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唐史。

吉柏江 经普安郡(今四川剑阁)、巴西郡(今四川绵阳市东北)至蜀郡。

玄宗幸蜀是有计划的,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哥舒翰败于潼关,玄宗就谋划趋蜀避敌,且在马嵬事变后军情不稳时也十分坚决,当时玄宗曰“朕须幸蜀,路险峡,人若多往,恐难供承。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图去就。”^[1](P233)]

之所以选择幸蜀避难,首先与杨国忠有关。天宝十载,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1](P3246)]唐王朝在西蜀布置了充足的兵力,当时的剑南节度副使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稔,甲兵全盛”。^[2](P6978)]其二,也与蜀地“路险峡”的地理条件相关。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然是避难的好去处,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可不依赖外界而独立存在,自成体系,从三星堆发现的独特的巴蜀文化,到诸葛亮《隆中对》中为刘备勾画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3](P913)]的战略蓝图均可略窥一斑。就在安史之乱爆发的次月,玄宗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颖王李璣为剑南节度使,入蜀途中,又命“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1](P234)]在蜀郡与江陵做好了部署,可谓是当年诸葛亮之策的翻版。从这一部署中,我们还发现,蜀地虽自成一体,但绝不封闭,通过水路,它可与长江中下游之间进行畅通无阻的经济交流。这在战火纷起、运河航运受阻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历史上,晋宋王室都曾南迁至长江以南,最终都划江而治,长江天堑既是保证他们安全的屏障,也是北上收复失地的巨大障碍。而西蜀既能借助与长江流域便利的交通而获得物质补给,又不致远离京师,使王室影响力大大减弱,自然是理想的选择。此外,蜀地经济状况良好。早在秦国时,就已修筑都江堰,充分利用岷江的水利资源,因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粮食产量丰富,诸葛亮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国富。”^[3](P912-913)]剑南节度副大使崔圆曾向玄宗上表称“蜀土腴谷,储供易办”。^[4](P4641)]气候又适宜蚕桑,蜀锦当时很有名,成都因而有“锦城”之美称,杜甫脍炙人口的诗句写道“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丝织品在唐朝是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蜀地的富庶自是显而易见了。上文所述益州贡春彩十万匹一事就是明证。

玄宗幸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当年在长安城中被压抑的太子获得了政治发展的机会和空间,马嵬事

变后,太子分兵北上灵武,自立为帝,尊玄宗为太上皇,形成二圣并立局面。又因为宦官李辅国的忠实追随,肃宗对其大加任用,使玄宗时已开始的宦官掌权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后,宦官专权一发不可收拾。其次,因为玄宗幸蜀后所需的物质补充只能来自江淮州县,从而使长江水路地位显著提高,在繁忙的运输中,这条水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加快许多。这对江淮与荆襄地区经济的开发是有促进作用的。流亡宫廷对奢侈品的需求,对蜀地经济,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更是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另外,大批官员、文士相继追随玄宗至蜀,杜甫曾在安史之乱后写下“二十一家同入蜀”的诗句,他们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蜀地的繁荣与此次“天子巡狩”不无关系。

二、代宗奔陕

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北庭的军队大批征调入援平叛,“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2](P7146)]至宝应元年(762),吐蕃入寇,取河西陇右地,广德元年秋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东),边将告急,权阉程元振却不上奏皇帝,直至“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高晖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周至等县。”^[1](P273)]代宗才慌忙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自己则于十月丙子(初七)仓皇东逃,吐蕃进入长安。

敌自西来,代宗只好东奔,这与当年潼关失守、京师东边门户洞开,玄宗只好巡狩西蜀是一个道理。但方向虽定,具体目的地却并不明确。至华州,“官吏藏窜,无复储拟。会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1](P273)]战时状态下,最重要的是手中有兵马来御敌,想当初,代宗初出长安苑门,“射生将王献忠率四百骑叛,胁丰王已下十王归京。”^[1](P273)]面对拥兵反叛的武人,代宗无可奈何,只能望尘兴叹而已。故而当宦官率军来迎,匆促之间,代宗别无选择,自然会从其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当然,陕州地当长安以东的道路要冲,物资集散方便,有利于兵力与财富的调拨,应也是代宗同意入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次出奔是十分仓促的,当高晖引吐蕃军过邠州(今陕西长武),代宗才知实情,当敌军前锋已至武功、周至,代宗才仓皇离京,与玄宗安排周密的西蜀之行不可同日而语,好在陕州离长安很近,代宗所走是东出潼关的路线,即以前经过函谷关的道路,过陕州再向东可至东都洛阳,这是

唐代重要的官道,路况条件好,“辛巳(十二日),车驾至陕州”,^{[1] (P273)}仅用了五天。当京师收复,十二月丁亥(十九日),车驾发陕郡还京,甲午(二十六日)至,因为不再需要太过急迫,所以归程耗时七天。

这次事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天子对直属皇帝的武装力量更加重视,开始着力扩充禁军并委以日益赢得唐朝皇帝信任的宦官典兵。神策军本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于天宝年间所设,驻于临洮(今青海乐都)磨环川,安史之乱后奉调入援,驻军陕州,卫伯玉为节度使,代宗幸陕时,鱼朝恩任神策军观军容使,还驾长安后,此军也随从入京,成为禁军,并发展成为唐后期中央政府控制的唯一的军事力量。神策军自有统帅,但由宦官监领。宦官典兵,使宦官专权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成为唐王朝肌体中无法治愈的痼疾;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神策军的存在对加强中央集权,镇压藩镇叛乱,维护唐王朝生存有一定的作用。此次出幸为时较短,故对陕州经济文化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不过,陕州始终是唐代军事要地和重要的运输枢纽。

三、德宗入梁

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安西、北庭兵五千前往襄城平定藩镇叛乱,经长安时,因未得赏赐而于城东浐水发生兵变,德宗急派人安抚,而“乱兵已阵于丹凤阙下”,^{[1] (P337)}德宗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其夕至咸阳,饭数匕而过”,^{[1] (P337)}至奉天(今陕西乾县),“上以奉天隘,欲幸凤翔”,^{[1] (P337)}适逢凤翔军乱,节度使张镒被杀乃止。而当时乱军拥朱泚为帝,围攻奉天月余,城中资粮俱尽,十一月,河北前线的朔方军将领李怀光率军解奉天之围,朱泚遁归长安,“各方贡物继至,用度始振”。^{[2] (P376)}但由于中央对朔方军一贯的不信任,于是,李晟请通蜀汉路为备,此后又以怀光反状已明请德宗幸蜀,使得李怀光最终于兴元元年(784)二月反叛,德宗从奉天出奔,经周至,出骆谷关,入悦骆道,南至洋州(今陕西洋县)、城固(今陕西城固),西行至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条道路人烟较为稀少,“骆谷道隘,储粮不豫,从官乏食”,^{[4] (P4866)}以致“上在道,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2] (P7417)}李怀光乱平,德宗六月十九日改从褒斜道还京。

当时,梁州仍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稻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1] (P3406)}当兴元元年四月,“时将士

未给春衣,上犹夹服,汉中早热,左右请御暑服,上曰‘将士未易冬服,独御春衫可乎!’”^{[1] (P341-342)}德宗因梁州贫,又欲幸成都,因严震、李晟劝阻而未成行。总之,德宗驾幸奉天、梁州二地,由奉天入梁州是在面临李怀光围攻的危险,且李已与朱泚联兵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德宗还曾因二地隘、贫,欲幸凤翔、成都。可见,德宗本只是想幸奉天或条件稍好的凤翔,此二地均在关中,也就是说德宗起初并不想远离长安,这是因为当时并未觉得五千人的泾原兵变会有太大危险,以为平定指日可待,但却未料到小小的兵变引发连锁反应,德宗只好再次銮舆播迁。

之所以选中梁州,不是因其富庶,而是与其位于川陕连接处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因山南地贫,粮食供给不足,有宰臣建议德宗幸成都,严震、李晟等文武官员竭力谏阻,严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声援。如幸西川,则晟未见收复之期也。……议未决,李晟表至,请车驾驻驂梁、洋,以图收复。”^{[1] (P3406)}加之当时西川局势不稳,建中四年十一月,“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2] (P7378)}于是,德宗最终止步梁州,未再南下。玄宗时安禄山以二十万大军反叛,德宗时情况显然与之差异很大,玄宗当时决定入蜀符合情理,而以德宗时的局势,显然选择梁州更加适宜。

德宗的这次经历,反映了一些内地节度使力量过于强大,他们表面服从中央,实际具有割据倾向,与河北藩镇比,虽非朝廷的心腹之患,却常常成为燃眉之急。这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中晚唐之际始终存在,且中央影响力日益缩小。此外,面对皇权受到的冲击,德宗转而亲信家奴,使得宦官势力再次抬头。“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2] (P7353)}德宗出逃时,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随众内官扈从,宦官又渐掌神策军。逃难的经历及地方军将势力的日益壮大影响到德宗对武将的信任。返京后,德宗深感拥有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禁军的重要性,遂不断扩大神策军,并于贞元十二年(796)设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由窦、霍二人充任,将禁军统帅权交给了宦官。

这次出逃,在奉天约为五个月,奉天升为赤县,在梁州约为三个月,当地号称“供亿无缺”,^{[1] (P3406)}以前述梁州经济状况而言,老百姓必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才能满足皇室和军队的需求。返京前,德宗“诏以梁州为兴元府,南郑县为赤畿”,^{[1] (P343)}梁州人民总算得到了一点回报。但比起玄宗在成都所居的一年多时间而言(天宝十五载六月——至德二载十月),流亡政府对兴元的影响显然要小于当年玄

宗时对成都的影响,兴元并未因沾了龙气有太大改变。

四、僖宗两迁

僖宗乾符元年(874),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六年(879)十二月,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潼关,直逼长安,百官逃散,僖宗与宦官田令孜只带了四个王子、几个妃子及五百卫兵,偷偷从金光门溜出长安,向西奔逃,一路上,“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2][P8240]}过咸阳,至骆谷口,凤翔节度使郑畋谒见僖宗于道旁,请皇帝留在凤翔。僖宗答曰“朕不欲密迩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2][P8240]}十二月九日,至壩水(今陕西洋县西南),下诏给兴元、东西二川帅臣,“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预为备拟。”^{[2][P8241]}

此后,又经城固,十八日至兴元府。这次仍走的是德宗曾走过的傥骆道,“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2][P8243]}又因“兴元储偁不丰”,^{[2][P8245]}田令孜等又劝僖宗入蜀。中和元年(881)春正月,僖宗入金牛道,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二十八日抵成都,一住就是四年,光启元年(885)三月才返回长安。但不久,因田令孜与河中、邠宁、凤翔节度使争权,此年十二月,李克用进逼京师,田令孜又迫僖宗出开远门,至凤翔府。次年正月,“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2][P8329]}邠宁、凤翔节度使尾追不舍,遂又逃往兴元。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栅绝险要,烧邮驿,上以他道以进;山谷崎岖,邠军迫其后,危殆者数四。”^{[2][P8331]}经凤州、兴州(今陕西略阳),三月十七日抵兴元。此次行进路线起初为故道,后因栈道烧绝,启他道崎岖至山南。因敌军内讧,关中形势好转,僖宗于光启三年(887)三月还至凤翔,文德元年(888)二月返回长安,又客居兴元近一年,凤翔一年,前后共计八年之久。

僖宗作为末代皇帝,比起前辈们更是悲惨,第一次出京,本欲避黄巢起义军的锋芒,从诏书中“且幸兴元”之语,可见僖宗当时对前途的估计尚比较乐观,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出逃前,“(田)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2][P8222]}安排腹心掌控了东西川和山南西道。僖宗至壩水又令三地“预为

备拟”,后看到一时半会无法返京,兴元与成都的物质条件无法相比,因而奔蜀。待到二次出京,僖宗已成为宦官与藩镇争权夺利时手中的一张牌,从次数、时间与狼狈状况,我们均可看到唐王朝日薄西山的惨状。

由于僖宗在成都停留了四年,“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2][P8248]}沿长江而来的江淮租赋源源不断运抵成都,对蜀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唐后期,人称“扬一益二”,其实作为战时的陪都,成都的繁华应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士、艺术家大量入蜀,五代时西蜀成为当时中国两大文化中心之一,与僖宗皇帝在成都地的久居无关系。至宋代,蜀地文化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僖宗在兴元前后两年多的逗留,也有助于打破此地的闭塞落后状况,促进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气息的增加。

五、结语

几位唐朝皇帝的避难所的选择或是精心而为,如成都、兴元;或是仓促选择,如奉天、陕州。但不管怎么说,都使唐王朝在危机中获得了喘息机会,从而东山再起。其方向与地点的选择首先受敌人来攻方向的限制,其次,与最终选中的目的地自身的经济、地理条件有关;另外,还与唐王朝对当时局势的判断有关。

唐朝皇帝的出幸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对驾幸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避难蜀地的时间最长,对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但总而言之,避难虽可解燃眉之急,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王朝衰亡的命运,僖宗时长达八年的两次出奔已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 陈正奇】